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五二期 ——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2 d)

【史海钩沉】“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 林彪事件与我	高厚良 李文普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
• 高厚良 •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已经过去29年了。在事件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举报有功的林豆豆（立衡），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名人。随着时间的演变，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这位林豆豆却逐渐地发生变化，近几年不断通过境内外的各种书刊，散布了大量奇谈怪论，如说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绑架上飞机的；“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说林彪“竟不知道空军有个作战部”，提林立果任作战部副部长是叶群和吴法宪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一年后才知，吴法宪在这件事上承认撒了谎，向豆豆道了歉；还说空军把她当林彪留下的“钉子”，成立了专案组，将她“每天押送到空军学院和空军大院接受大会小会批斗”，逼得她服安眠药自杀，说“关押两年，整个人变形”；在“压力”之下，与张清林结婚，转业去郑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这些话，起初载于香港×报一篇署名萧萧写的《林彪女儿对林彪出走的披露》，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编排的《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予以转载。大陆作家官伟勋写的《我所知道的叶群》，林立果的未婚对象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等等，加上那些爱猎奇的小报都引述林豆豆刻意编造的这类耸人听闻的说法。林彪大女儿林小霖一度也相信过妹妹的这些话，后来经过亲自找当时的一些知情人及办案人调查，才发现林立衡说的许多话，是信口说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言论，对历史、对人民极不负责。

尤有甚者，1998年8月香港出版的《天安门》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李衡

”的文章，标题是“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副题是“林豆豆访谈录”，文章说“真正逼林彪出逃的是毛泽东”，“弥天大谎加罪林彪”，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很多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当年逼供出来的档案材料。”还十分荒唐地说“叶群搞选美实际是为毛泽东挑美女进贡”等等，如果说以前林豆豆的一些奇谈怪论是缘于与父亲林彪的天然情感驱动所作的美化与洗刷的话，那么，现在这种颠倒黑白的方式已经是蓄意谋划的结果了。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曾亲自参与处理林立衡相关问题的历史见证人，我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披露出来，以正视听。

林豆豆现在诬蔑空军对她大会小会批斗，逼得她自杀等的许多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是肯定林豆豆举报有功，要对她加以保护的。

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社参加学习。报社同志事先听到总政工作电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林立衡经过前一段学习之后，应回到空军报社接触群众，一起学习，以党员相待，同志相称。她在空军报社是有错误的，要帮助她提高认识，接受教训，并要注意她的安全。”

当时空军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学习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直接领导，机关工作组组长是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李平，工作组成员李珉直接掌握报社的学习。《空军报》因有错误停刊，报社成立了一个陪同林豆豆学习的小组，成员有后来任空军报社社长的金为华、张炳根，有各处处长和编辑徐臣、龚克平、石玉增、谭先德等人。当时规定了几条：一是不许追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不问也不许打听。她写的材料密封，直接上送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二是学习情况由李平单独整理成简报上送中央和总政，每期印7份，由金为华执笔，经李珉报、李平审核完稿上报。前后共写了59期。三是真诚帮助她提高认识，保证她的安全。

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李珉说“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说她“起义”的事实根据是：1971年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接到李作鹏、顾同舟密报的毛泽东主席在武汉、长沙召集几个省党政军领导干部打招呼的讲话内容后，决定按《571工程纪要》预定计划搞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打电话通知在北京的林立衡带张清林和张宁乘飞机赶到北戴河。7、8日两天，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吃洋面包、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

9月8日晚，林立果乘飞机去北京，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她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说到林立衡的错误，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在空军报社支持造反派打击迫害一大批政治部领导、二级部正副部长，还“以我划线”把报社5名正副处长，包括她所在的三处处长林毅、袁亮还有赵鹏、刘昌东、许广信打成“反党小集团”，大会小会批斗（林立衡多数时间在场坐镇——笔者），几年后或送农场监督劳动或送空军“五七”干校作所谓“后补学员”进行管制。1967年3月才参军的林立果被提升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之后，1965年3月才参军的林立衡也同

时被提升任空军报社副总编辑。在报社靠林立衡支持的造反派骨干李同云、章×、王××都被提升为报社的副总编辑。王××主要陪同林立衡在外活动、写文章，报社日常工作由李、章二人主持，但大事都及时报告林立衡。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所谓“讲用报告”之后，8月3日空军政治部党委第67次会议讨论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同时向空军党委建议提升林立果任空军副参谋长，林立衡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为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请林立衡给政治部干部作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报社参加部党委会议的李同云说，“我和大家心情一样，立果同志，立衡同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感情最深。立果、立衡同志永远是我们报社的好领导，报社永远听立果、立衡同志的调动指挥。”根据政治部党委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由副秘书长王连城、秘书处张发云起草了一个紧跟林立果、林立衡的5条措施，其中规定：

“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教他们，处处保卫他们，要“老老实实服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

周恩来总理看到这5条之后，斥之为封建法西斯的东西。

当时，林立衡对这5条确实有不同意见，曾向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提出不要下发，但未被采纳。林立衡没有在政治部作讲用报告。不久庐山会议上林彪夺权失败，吴法宪挨批，提升林立果、林立衡的建议才被搁置起来。

1971年9月5日，即林立衡去北戴河前夕，她在空军报社党支委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现摘录几段，读者不难看出她当时的心清：

“生活在我们周围就要准备迎接风浪，最有意思的是迎风浪。我自己每天准备着迎接阶级斗争风浪。”

“我到空军来，天天摔跟头。我的名字可以改为‘斗斗’，也可以改为‘逗逗’，要乐观。这几年长了不少知识，长了身体。首长看见我的身体不大好时，就赶到报社来说：‘去去去，快到报社去’”，说“你一到报社，你的身体就好了。”

“首长身体很好，以前作战时负了伤，内部有四颗子弹，不是要害，内脏很好，但睡觉不好，有时精神很痛苦。他那么大的年纪，但他有坚强的毅力，看了很令人感动，他比一般没有病的老人内脏还要好。……有这样的身体也不容易。首长强调乐观，给我题字“要乐观，坚持到底”。

“去年这时正开庐山会议，我们想不到，就是跟不上，今年再跟不上就不行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别的要求没有，还是那次提的，就是要把住关，对内对外把住关。将来的路途不会那样平坦，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使报社不要转向。”

“将来的形势可能不是以前的形势，总是要革命，革命就是革脑袋嘛，不要怕掉脑袋。反正一条，横下一条心，什么都不怕……但战术上要稳扎稳打。……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学习，缓和时学，紧张时就干，赶快吃饱，不然到时就没劲。弯弓待发，现在是弯弓的时候。……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环境下，能保持冷静与清醒，特别是用今天的心度来衡量那时的言行，没有人没有错误。林豆豆作为林彪的女儿，讲这些话，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想往上贴，唯恐贴不上，林豆豆的这些话也未必能说明她和林彪的思想路线完全相同，也谈不上参与林家的阴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林豆豆离开玉泉山之后，同张清林一起住在空军大院附近的警卫一师，学习时由一师两位中年女同志程言翠、侯颜娥陪同到报社来，不是把她当林彪留下的“钉子”当敌人“监督”，而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1972年9月1日，林豆豆回到报社，大家对她客客气气，为她开了欢迎会。她开始表态不错。她说：“受到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接见，激动得两宿没有睡着。”她说“毛主席对我很关心。”“中央首长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过去生活在林彪这样的家庭，有不少的缺点错误和罪恶，愿意向群众揭发交代。这一次一定要很好学习，改造世界观。”她还说：“空军报社的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的根子在我这里。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要向同志们请罪。”当天晚上，她又几次对陪同她到报社来的程、侯二位女同志说：“没想到报社的同志这样热情，很受教育，很感动。”

9月8日，林立衡在小组讨论中发言说，1971年9月5日，我在报社支委会上的那次讲话，错误是严重的。“我有时听到林贼一些反动言行很气愤，另一方面，还觉得他过去打过仗，理论上也有一套，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希望他早点死，保持个晚节算了。”

9月20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对林彪“518”讲话（即大讲政变的讲话）作了一次批判发言，并参加了一次党小组会，大家反映较好。

9月28日，林立衡在同程、侯二位女同志闲谈中说，“过去我与林立果是同盟军，有些情况我是从他那儿知道的。在北戴河林立果叫我到他住的楼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不得不表态‘跟你们一起’。我如果不表态，就暴露了。”（请注意，林立果9月8日去北京后，她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去当面劝阻林彪。她说怕暴露显然是怕林彪——笔者注）她还说“张清林是我看中的，叶群看不上他。71年4月来北京，先在三〇四医院学习，后住在邱会作家，到了8月8日，我们的关系才确定下来。”

29日下午，林立衡参加了报社批林彪的大会并发了言，大家反映较好。

林立衡态度的变化是从报社进入揭批查《空军报》的问题后逐渐演进的。开始她在发言中，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是“有所认识、有所警惕、有所察觉、有所斗争”的。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说她“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把报社造反起家的李同云等几个人说成是同她一起“向林彪作斗争的战友”。后来进一步把他们在文革中干的坏事解释为“反林的方法策略问题”。林立衡的认识与事实是极不相符的。实际情况是——

1969年6月林彪通过林立衡向报社人员传达，要把《空军报》办成一个“实验室”。林彪说：“我就是抓两个报纸，《空军报》不行抓《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不行抓《空军报》。”1969年6月在林立衡参加的一次支委会上，王

启夫痛哭流涕谈对林立衡的感情，说“立衡同志是推动我们报社前进的动力，鼓舞的力量，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立衡同志工作最辛苦，休息最少，工作最多。她时时想的是阶级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李同云说，“林立衡是‘三忠于’的榜样。林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贡献的，她的一张大字报（指1976年1月13日江青讲话后，林立衡宣布参加报社“愚公移山”造反派的大字报——笔者），在空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局面。林立衡同志永远是我们报社的支部书记，报社大方向是她掌握的，没有立衡同志就没有报社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一家。我们下半生能和立衡同志在一起工作、生活感到无比的幸福。”还有人说，“我们事事处处要为立衡同志争光，我们就是要紧跟立衡同志走。”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空军报》连续发表林立衡参加炮制的五篇评论，极力吹捧林彪。经林立衡同意，又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改成三篇文章以“学果文”“向立”“薛进”的署名在《空军报》头版连续刊载，制造舆论。

从1972年10月以后，林立衡却又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传她一贯反对林彪，说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1973年1月9日发言说“9·13以前我没有报告，主要是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大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就说“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林立衡随意讲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时，她就经常借口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总政李德生主任不相信我，李平主任也不相信我。”“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1973年4月28日，林立衡在报社发言，讲了6个问题，集中宣扬她“一贯反对林彪”的观点。报社打击迫害5名正副处长的问题，本来是她幕后策划坐镇指挥的，她却把责任推到苏天中（原跟随她写文章的副处长，因向叶群报告林立衡与保卫部陈干事恋爱而被她赶走——笔者注）身上。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是经她审查大样之后发表的，她却矢口否认，说“根本不知道”。

1973年5月23日，林立衡出麻疹，送302医院住院治疗，5月29日出院。6月林立衡又按李震、郭玉峰的交代写材料，没有参加报社的学习。

6月底和8月28日，林立衡只参加过两次党员会。9月，林立衡来报社6次，其中4次是学“十大”文件。有时半天学习，只说三、四句话。10月20日，空军报社改选党支部，通知她参加，她称病未到。

就在这段时间，空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集团的罪行。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我被任命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政工作组将清查揭批工作移交新组建的空军党委。8月总政工作组曾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根据林立衡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彻底转变其立场、观点，还需做长期、耐心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目前《空军报》即将投入复刊筹备工作，为了给她一个更好地接触工农，接触实际的条件，建议下一步到一个安全条件好的五七干校锻炼一个时期，争取边劳动边读书边搞大批判的方法，逐步把她的思想引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当时，周恩来总理说，将林立衡继续留在空军学习，再看她半年。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东交民巷空军报招待所新高干楼8号选了一处房，让林立衡从警卫一师搬进去住下（张清林到总后参加学习）。从各军区空军选调一些水平较高的女干部组成一个帮助小组陪同她一起学习，报社的金为华、谭先德、石玉增等同志也参加。组长是民航总局副政委、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诸惠芬，金为华任副组长，组员有尖子女飞行员汪云、张玉梅，还有各军区空军选调的

副指导员、排长、女军医，护士长周慧芳、郭玉莲、李建军、张香丽、马志敏等。警卫一师的两位女同志程言翠、侯颜娥也到空军招待所同学同住。

1973年12月25日，总政李德生主任接见了小组同志，李平和我参加了。1974年1月3日，李平、我和小组负责同志一起找林立衡谈话，让她搬到空军招待所。1月7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很不像样，仍然坚持她“一贯正确”的错误观点，说“尽管个别人要搞阴谋，想刁难侮辱我，那也是办不到的。”

1974年春节，空军政治部领导特意在招待所安排一些酒菜，请林立衡和帮助小组同志一起欢度春节。林立衡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举杯祝酒贺节，金为华等人和大家共喝了一两瓶酒。

金为华说：“当时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林立衡提高认识，促使她有所进步的。并且也试图和她以同志的态度研究《空军报》的问题和教训。为此，大家费了不少心，做了很多工作，真是仁至义尽，结果与我们的心愿完全相反。”

林立衡在空军报社始终是个特殊人物。虽然长年带着王启夫在全国各地为自己和林立果选对象，一年在报社的时间很少，干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她始终是空军报社与林彪、叶群沟通的联系人。吴法宪有时也要请林立衡带题目回毛家湾寻求林彪、叶群的指示。如空军党委给林彪发致敬电，能不能在《空军报》上刊载，吴法宪就是通过林立衡取得林彪同意之后才公开发表的。宣传林彪的一些尖端语言也是《空军报》首先发表。报社造反派干了不少坏事，靠的是林立衡的支持，凡大事，他们都首先向林立衡汇报请示。有时林立衡做不了主而去询问林彪、叶群，但报社李同云、章×去不了毛家湾。所以报社李同云等人的后台自然是林立衡。

林立衡在学生时代就闹过一次自杀。据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长李文普说，那是因为个人恋爱问题，不是像官伟勋书中说的同叶群政治观点有分歧。第二次自杀是在1968年，她看中了空政保卫部的陈干事，叶群不满，动手打了她，她服安眠药自杀，被老保姆王淑媛发现送三〇一医院抢救。第三次自杀是在空军学习期间，她去警卫一师取东西，在那里服安眠药片自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4年2月中，林立衡住在空军招待所高干楼，向组里同志提出，要去警卫一师原住房取东西。金为华等人研究，没有理由不让她去。便叫负责安全的谭先德带两名女同志（其中一名是医生）陪同她去警卫一师。林立衡一进房门就反手上了锁，过了20分钟，谭先德呼叫无人应，门锁了推不开，只好砸了窗户玻璃进房发现林立衡服药躺在地上，女医生用手指插进喉咙，迫使林立衡吐出一些东西。谭先德抱着她的头，摸她的脉搏都正常，随即叫车送空军总医院抢救。医生问她吃了什么东西，她不说，化验她吐出的东西，判明是安眠药片。我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转送三〇一医院治疗。三天后出院回到空军招待所。检查她手边还有非那更51片，乘晕宁16片，还有冬眠宁、安乃静等多种可以致毒的药物。服下的安眠药有20片。服药的原因她不说，小组同志分析认为，她自以为举报林彪叛逃有功。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奖赏。《空军报》复刊没有恢复她的领导职务，反而要她检讨在空军报社所犯的错误；许多问题她难以自圆其说，内心抵触而服药自杀。也有人认为她手上还有很多致毒的药片没有吃，她这样做，并不是真想死，而是对组织的威胁。

2月13日，林立衡就她自杀问题作了一次检查。说“事情发生之后，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心，送医院治疗，我很感动。”但又说自杀是被迫的，关键在领导，不自杀没有出路。为怕她再出事，小组确实加强了防范措施。把住房窗户钉死，昼夜有二人轮流值班看护。那时是二、三月份，天气寒冷，根本没有她后来编造的

放蚊子咬她，用灭蚊药薰她，“整”得她变了形体重只剩三十几公斤的事。

1974年3月“批林批孔”开始，林立衡和帮助小组部份同志即搬回到警卫一师招待所的二层小楼上，以保证她的安全为主。

那时，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派人给空军领导送材料，谢静宜和苏延勋就住在空军招待所。帮助小组所写的林立衡情况简报是不是通过谢静宜送江青？我决定还是按原规定送总政报周总理，不送江青。这时，林立衡却写信给江青称“江妈妈”。信给了谢静宜。据谢静宜说此信她们交给了周总理而未交给江青。

4月11日和19日，林立衡两次写信给我，提出“组织上现在还没有把我定为林彪死党”，对派人看护她表示不满。

5月，林立衡在小组内公然表示：“我自己的问题我愿意讲就讲，不愿意就不讲”。她叫小组同志帮她买了歌本字帖，经常唱歌练字。为了她锻炼身体，专门安置了乒乓球室和下棋的地方。林立衡也时常跟小组的同志打乒乓球、下棋。她还经常在室内围绕乒乓球桌跑步。有时一次就跑五、六十圈。当时小组同志考虑的主要是安全，几年学习，从来没有要她写一份对她自己问题的检查材料。这就是所说的“逼供信”“专案组”的实况。

5月21日，诸惠芳回民航工作。组长由航空兵十三师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优秀女领航员于富芝接任。24日林立衡拿出一封信给我，说希望领导想想“真理是不是全在自己手里。”说什么“查问题二十年总可以了吧？”其实帮助小组主要还是担心她的安全问题。因为林豆豆闹自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对空军前一段帮助林立衡的工作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对林豆豆，空军一直是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李德生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做工作的。后来周总理生病，李德生调沈阳，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说，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空军党委研究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安置林立衡和张清林。7月29日，我向林立衡、张清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林立衡表态说：“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在百忙中还关怀我，确实感到我们党的英明伟大。自己各方面的错误很严重，今后一定要努力锻炼自己。”当晚，张清林从总后搬回到警卫一师。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

1974年8月2日，空政干部部派人陪同林立衡夫妇到河南开封。林立衡后来在报刊上说什么当时空政组织部副部长“威逼”她们结婚，“否则豆豆去开封，张清林去嫩江，而且两人永远不得见面”等等，这纯属编造。张清林是她自己选中的，林彪、叶群出逃前几个小时曾当面为她俩人举行了订婚仪式。相隔数年，结婚本很自然，空军有什么必要威逼他们成婚呢？他们结婚是他们自己写的报告，是我批准并同她们俩人谈的话，哪里有个什么组织部副部长逼他们结婚呢？

林立衡在开封农场，只干一些轻微的劳动，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1975年10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后决定让林立衡夫妇转业处理。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林立衡在报刊上说“她们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拿不到购粮本、肉证，也领不了工作证，仍然用假名，从此化名路漫，十四年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黑人。”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转业是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工厂按厂级领导干部对待，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小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豆豆，规劝她为人要正直，要诚实。1977年冬天，粉碎“四人帮”之后，林小霖打听到豆豆在郑州，不顾一些亲友们的强烈反对，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探望妹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那时，林立衡就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林小霖说，“不管中央过去是怎么说的，如果有假，你就可以写出来”，林立衡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小霖看，林小霖看后觉得林立衡所写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还说叶群“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林小霖当时就觉得林立衡说这些话太假，便说“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我们想问题说事情要从事实本身出发，不能只从林彪是我们父亲要为他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样姐妹俩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林立衡一心为林彪辩护，把他干的事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什么错都没有。林小霖争辩说，“我认为父亲至少有三条错误：一是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对毛泽东有意见有看法为什么不能像彭德怀那样把意见看法都公开摆出来，即便受到打击报复，后人也会觉得公正无私受到世人的尊敬。三是文革中那么多老干部被打倒，受折磨，周恩来费尽心机保护了不少人，而林彪除了保护扶植黄、吴、李、邱几个亲信之外，他和江青、叶群一起整倒了许多老干部，而且有些老部下都被整得很惨。姐妹俩分歧严重，谈不到一块。对于林彪出走的情况，林小霖一度也相信父亲是被“劫持”走的，中央讲的不是事实，但认为豆豆假话太多，真相如何，非亲自调查一下不可。她决定亲自找同林彪一起上车被林立果开枪打伤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查问。李文普如实叙说了林彪出逃的经过。林小霖认为“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林立衡当时在8341部队2大队给北京打电话，根本没有亲眼看到林彪上车出走的情况，在场看到的还有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怎么能坚持说林彪是被绑架走的呢？”

林立衡两口子多次向人说“李文普那一枪是自己打的。”林小霖认为“李文普听到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他不愿跟着去苏联，当叛徒，既然下了车，干嘛还要打自己一枪？”林立衡还说，“纪登奎找李文普谈话，李文普提出不开除党籍，不当敌我矛盾等三条，要求和纪登奎搞政治交易，所以才作了伪证。”这简直天方夜谈！李文普是审查的重点，有什么资格与审查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搞交易作伪证？谈话在场的有搞专案的好几个人，纪登奎也不可能向李文普私下许愿。以后李文普转业去山西的一个小厂工作，工资很低，离休后回到北京与妻子团聚，只住一间单元房，报销医药费，领工资还得到山西原单位。林立衡通过张宁的书对李文普的种种污蔑完全是信口雌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文普年过七十，身患多种病痛。林小霖对李文普的处境十分同情，对林立衡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污蔑李文普，感到十分气愤。

林小霖说，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住在玉泉山，主动写了多份材料揭批林彪，现在又说是谢静宜逼供信并对她的材料肆意篡改而成的。为澄清事实真相，1988年，我亲自找到谢静宜调查这件事。谢静宜说，当时中央主持清查林彪案件的是周恩来总理，怎么可能逼林立衡揭发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我当时奉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的指示，去玉泉山与林立衡保持联系。她写的材料全部密封送交周总理，我不看，更不敢篡改。林立衡给江青称她为“江妈妈”的信，我也只交周总理。政法机关对笔迹是可以鉴定的，林立衡的字与我不同，她亲笔写的东西都在中央档案馆，怎么能说是我搞逼供信改的呢？

林彪打仗有功，“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许多人迷惑不解，加上毛泽东晚年错误严重，有些人对林彪之死有惋惜之情。林立衡报案有功而没有得到重赏，也有些

人对她寄予同情。她说的话被一般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当成“九一三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某些报刊爱猎奇，把她的所谓“披露”当成“宝贝”广为传播，这就造成了误导。林小霖说：“我有两个孩子，她没有后代。从私利出发，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更希望给父亲翻案。可是，我是个共产党员，要尊重历史事实，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后代负责，实事求是，不能像林立衡那样对社会不负责任，信口胡说，欺骗世人。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林彪的案子中央早有定论，审判早已公诸于世，铁证如山，想翻案是翻不了的。林豆豆的许多假话本来不值得过于重视，一一批驳。只是有些报刊还在随意炒作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有些人又以假为真，人云亦云。所以才不得不把林立衡的若干材料，都公之于众，补上这一个小小的空白。倘有必要，我还有一些材料可以在适当时候公布。

最后，我们也愿意和林豆豆说上几句知心话：

林彪元帅作为你的父亲，你爱他，没有错；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历程中功勋卓著，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但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阳奉阴违，不讲真话，阿谀毛泽东，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陷害历史上和他有过节的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出的品质是恶劣的；在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后，他同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等人发生分歧，实际上同毛泽东发生分歧，在确立的“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胁后，不是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解决，而是采取阴谋的方法，企图武装政变，另立中央，阴谋杀人，最后彻底败露，逃向国外，自取灭亡……这步步升级的非理智行为，已经让你父亲、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帅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一个受人尊敬战功卓著的元帅蜕化为一个政治败类。你强调，是你母亲叶群与弟弟林立果“胁迫”的结果。我们不否认，叶群、林立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以你父亲林彪那种老谋深算的性格，他是那种受人左右的人吗？别人做得了他的主吗？

在这个问题上，老婆、孩子掺合领导人政治上的事，领导人利用职权为老婆孩子谋利益，你们家在中国近代可谓登峰造极了，危害有多大已是世人皆知。对于后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个教训。

但是，不管老婆孩子怎么拨弄，拿大主意、拍板定夺的还是林彪。别忘了，据所有的目击者报告，你父亲是自己爬着软梯上飞机的，不是叶群和林立果把他抬上去的！

豆豆，你虽然也50多岁了，但还有精力，可以做点对历史、对现实都有益的事。说心里话，我们也很同情你。记得90年代初，陶斯亮写过一篇《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发在《中华儿女》上，我们读完文章，首先为你叹息，命运对你是不公的。在中国前几十年的政治环境下，父母倒台，儿女不可避免地要跟着倒霉。而你本来在举报林彪叛逃上是立了功的，是后来《空车报》的是非纠缠影响了你，也是你的性格、你的家庭影响了你。但这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也没机会、没必要改变了。但你还能做点好事，像当年大义灭亲一样。比如，实实在在地写一部关于你所了解的林彪的什么书，既不刻意美化他，也不故意贬低他，事实怎么样就怎么写，特别要剖析一下他的演变过程，不靠主观臆想，靠事实说话，靠证据说话。你看过《中华儿女》发表的毛毛所写的长篇连载《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吗？那是多么有历史价值的好书哇！无疑，毛毛也爱他的父亲，但她的这部书是以真实的故事来赢得读者对他父亲的崇敬与爱戴的，你看实事求是有多么重要！希望你能动笔写。我们也相信《中华儿女》同样会继续给你足够的版面。

为林彪翻案，做为林彪的女儿，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真实的历史和确凿的事实面前，又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你和张宁所抛出的东西，我们料定今后只能进“野史”，弄不好多少年后成为新一拨无聊文人“戏说”的资料。但我们相信，即使到那时，他们也还会把他描绘成一个先是神秘莫测的大将军，后是一个不光彩的政治家的形像。调子，是你父亲林彪自己定的。

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番话。

□ 高厚良（原空军政委）口述，高德明整理，原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 ∞ ∞ ∞ ∞ ∞ ∞ ∞ ∞ ∞

林彪事件与我

• 李文普 •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我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接受审查并成为“重点人”。后经组织结论并分配到外地，不久转业到地方，到1984年离休。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出书、写文章，说我是林彪“亲信”，林家的“总管”，“林彪夫妇事无巨细都经他过这‘筛子’”、“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都被他监控”、“他是北京方面安在96楼里的内线”，“中央警卫局派到林彪身边‘卧底’的人”。还说林彪出逃时林立果打我的那一枪是“自伤”。尤其是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对象，以“林家未亡人”自居、现已和美籍华人结婚定居美国的原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张宁，在国内外多次出版的著作中，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和好奇者的口味，在散布种种谎言、渲染自己的同时，却别有用心地对我进行恶意中伤，大泼污水。

说老实话，9·13事件如同一场噩梦。对党对国家都是一场灾变，对我个人也是如此，事过之后，真不愿去想它。

我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1948年入伍的。原来在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南下后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到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中间有几进几出，但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在林彪身边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叫干什么，我都是随叫随到，生怕出什么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管的事越来越多。“林办”人员不够时还要我兼做秘书工作。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回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反叶派，她有时对我不满意，但林彪不让我走，她也没有办法。

在“林办”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饮食起居、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事项，有人叫贴身警卫、叫卫士长，过去也叫副官，就是这个角色，终日不离林彪左右，应当说对林彪有所了解。

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间看望谈话都是自由随意的。不管在苏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见面活动，我

从不施加影响，也不去打听。林彪两部加密的红机子电话都是中办和军委总参通讯部门设置并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监控”的问题。我只是个普通警卫干部，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叶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敢布置我监控林彪的电话？我不敢也无这个需要这样做。电话守机员对首长打长途电话有登记，那是通讯部门规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听通话内容。

林彪平型关战役之后，被阎锡山军队士兵错当成日本人开枪误伤肺部，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他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如钙片他认为好，但医生又认为按他的身体状况吃多了并不好，没有办法，叶群、我和医生商量，在上海用淀粉加适当的粘合剂仿制成同样大小的“钙片”给他服用。

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林彪不愿意找他们看病，他们都很难见到林彪。遇到服药或定期大体检，他们向叶群提出建议，因为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所以叶群便叫我去劝说林彪采纳。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

在林彪不断得势、地位上升的时候，叶群都说林彪的身体很健康。老秘书关光烈因为向肖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画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间穿衬衣睡觉，早晨起床我给他穿衣服，他说又出汗了，我用手摸，果然衬衣汗湿了，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没有盖过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经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1966年冬天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给他穿了棉大衣，有时在天安门，有时乘敞蓬车。到西郊机场沿途检阅一次活动好几个小时，他也没有犯病。他有时患便秘，拉不出屎，几乎到了我们要用手给他抠出来的程度。有时大便略软细一点，他就认为是拉稀，找药吃。为了查清他肠胃的毛病，医生建议做钡餐照影，可是他不去医院，也不听叶群的意见，叶群要我去做工作。林彪听了我的话，同意体检。我和301总医院和北京医院专家一起，把机器搬进林彪卧室，趁林彪起床后，我把钡餐粉调好，一勺一勺喂到他的口里，使肠胃达到体检照像的要求。那次检查效果很好，搞清楚他的胃没有病。肠有一点功能紊乱。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15页中说林彪“实际上是个生命烛火摇曳暗淡的老人。”说“毛泽东数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林彪陪同接见，叶群为应付局面下令医生给林彪服食‘兴奋剂’，骗林彪说是‘进口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药性发作，厉害时竟然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等到药性稍缓，立即发车上天安门，人们所见他的红光满面是他‘药潮’未退。人们可能还记得他每次上天安门讲话的腔调拖得又长又亢奋，却没底气，因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气，每次下了天安门回到毛家湾便大病一场，数次连番用药，险折林彪性命，叶群曾为此嚎啕大哭过，自责道：‘首长这么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我认为张宁这番话缺少佐证。在我印象中，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在我的记忆中，她到“林办”有个十来次，但真正见林彪也就三四次，而且几次是陪同性质的。第一次她到毛家湾让她打乒乓球，林彪从帘子缝里看了看，没听他说什么话。第二次叶群带她来看了看，也没多说什么话。第三次是林家确定她，我们也都看了，林彪算是表了个态。再一次就是她到北戴河，还有陪同301总医院的领导见林彪

。张宁每次见林彪最多只几句话。因为这一点我清楚，主要是林彪有过交代，除见毛主席或周总理，一般到了20分钟就让我提醒会客时间到了。另外，据我所知，张宁作为林立果的未婚妻，虽然是林彪点了头的，但并非唯一同林立果交往的女青年，他在外面选的“妃子”很多，到山海关逃跑前还带着两个。林立果并非把她看得那么重，她也更没有照管过林彪的生活，完全是胡编乱造，显然是别人有意叫她这样写的。

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

在我到林办工作之前，听说他在广州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那是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的。从1964年我回到他身边，7年多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他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三次。那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三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并无苛求，容易伺候。吃的饭菜很简单，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做饭。他确实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觉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后他就不吃。平时主要就是吃点肉饼、青菜、馒头。他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张宁等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9·13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林彪的脑子很好，思维能力很强，讲话不喜欢秘书代笔照念讲稿。

1961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彪要在会上讲话，军委办公厅肖向荣主任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厚的讲话稿，叫我送给林彪，他对我说“不用”。林彪自己到会上即席讲话，谈三年困难是主席思想受干扰的结果，吹捧毛泽东如何“实事求是”，如何正确英明，使毛泽东大为高兴。

“批林批孔”中，说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不看书，不看报，许多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在林办工作的人员认为那是“四人帮”的“说法”，大多不信。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林彪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紧跟主席”。他还是一个爱学习爱看书的人。我随他到上海、大连、广州，他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由我给他算账付钱。有时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以后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或警句，就用笔划上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在大本上或制成卡片（叶群也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讲话的需要服务）。

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

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

林立果在庐山单独住了一座大房子，有专线电话，是程世清安排的。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各有什么打算，他们私下说过什么话，我们不清楚。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他特别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立果在庐山打电话给留在毛家湾的秘书张云生骂叶群瞎指挥是真实的。林彪对毛泽东政治态度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王焕礼是老秘书关光烈帮忙选的，对会议情况不一定清楚，叶群让他写，送上去没有我不知道。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叶群和江青表面上仍经常通电话问候送点东西，实际上是虚与应付。林彪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

在此期间，林彪说话很少，我也从不打听。在他周围，只有叶群、林立果和黄、吴、李、邱几个人了……

他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打电话亲自接谈之外，一般不接其他人的电话。其他人的电话都由叶群或秘书接收报告。有时中央开会他请假，是毛主席、周总理让叶群去代表林彪列席旁听。“文革”前期，叶群与江青勾结，经常到钓鱼台干坏事。林彪讨厌江青，不让叶群去钓鱼台。叶群就编造假话，让“林办”工作人员哄骗林彪。林彪对“四人帮”的印象一直不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到过苏州，到过毛家湾，趾高气扬，要他写讲话稿他不写，推给陈伯达，不把林彪放在眼里，我们是亲眼所见。林彪对张春桥很不满意是真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谈了许多情况，许多失之推测，有些恐怕是随便捡来，更多是主观描述，也难免是有目的的。在书中第168页到172页中说林彪“声息全无，像一副衣架，”说“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是不真实的。

9月6日，周宇驰帶著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帶著正谈恋爱的张清林和张宁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7日上午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宁加上空政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57号楼他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当时，“林办”工作人员一部份留在北京毛家湾，在北戴河的有秘书宋德金、李春生，总参二部的参谋倪煜，总政保卫部调来在8341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林彪的保健医生蒋保生、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叶群的司机小慕，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调来的护士小王。

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

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96号楼很平静，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报告首长，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在“林办”，叶群经常说些谎话骗人，但对林彪则看得不十分清楚。不过，林彪也有时反对说假话。在杭州，有一次毛家湾打来电话，说了一些林家丑事，叶群也让我不要告诉林彪，林彪知道北京打来电话后问我，我按叶群的话回答了，林彪发了大火，说“我枪毙了你！”后来，他知道是叶群搞的鬼，又向我道了歉。林家的事，经常就这样真真假假弄得人云里雾里，所以后来9·13事件前夕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警惕，这也是其中原由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张宁在对这一天的描述中，说到林立果动身去北京之前向她透露了高层斗争激烈，叶群“地位要下降”“北京被占领”等话语，并说“万一……出了事……我不连累你……你什么都不要说，听我的话。”这也许是真事。但说林立果是在叶群的逼迫之下去了北京，这不符合事实。林立果到北京看牙是假话，同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和他的“联合舰队”连夜布置谋害毛泽东是真。张宁留在北戴河本不了解实情，却在书中第205页有意为林立果开脱打掩护，说“林立果当晚九点半以后就到了毛家湾”，“当晚睡得很早，第二天确实去看牙齿，检查，拍片，验血等检查报告出来还得要两天。”

9日，北戴河96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10日中午刘沛丰带著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20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又带了什么东西走，我也不知道。我叫食堂给他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那时，我和刘吉纯的女儿想当兵，叶群突然关心起来，她问我“你的女儿多大啦？”我告诉她“在上中学”。她又问了刘吉纯女儿情况。她说：“明天有飞机来，让你和刘吉纯女儿来北戴河，让她俩去空疗学护士吧！”

我向刘吉纯说了叶群的想法，并向北京打电话，请于运深秘书帮忙安排小孩来

北戴河。于秘书马上帮助办了此事，两个孩子很快坐飞机来到北戴河。

作为一个中央重要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许对这些事都不敏感，加上我这人从不给首长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建议，遇到事情也不爱多想，只注意完成首长叫办的事情，所以对这一切都看成平淡不过的事情。所以，这几天尽管按后来的说法叫“充满火药的气息”，但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是谜……

9·13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

这天，我两次去空军疗养院找院长、政委办孩子当兵的事。向他们说明叶群的意见，傍晚又送孩子入院。

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长一般都住棒槌岛宾馆。棒槌岛靠海边，林彪怕见水，不愿住，住过黑石礁铁路招待所。那里房间小，空气不好，后来看中一座原大连市副市长住过的二层小楼，经过改建成了林彪去大连居住的寓所。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文革”以后，叶群为她选美，选了一个又一个，她不要，自己选中了空政保卫部的某干事，叶群知道后大发脾气，林立衡以死抗争，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她的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301医院抢救才免于死。除此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她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尽管我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96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晚上，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开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

上飞机呢？！张宁在书的第234页—257页用大量篇幅编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假话，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连起码常识都不顾。

第234页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自从9月10日、11日两天，李处长找他谈话以后，大杨的情绪陡然变化”、“从不喝酒的他，却喝得醉醺醺不论谁问他原因，他都不理睬，情绪显得烦躁暴怒。”大杨“工作隶属李处长直线领导，其他人管不了他。”、“大杨连续躲避大家三天，直到12日深夜开车载著林彪等人冲过警卫部队的防线，进机场并协助林彪上飞机，一同死在外蒙，整个过程非常沉默，始终没说一句话。没有大杨，林彪走不成，林彪有‘三不’，其中之一就是‘不是大杨开的车他不坐’”，“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了？因为只有李处长接触过他，所有‘林办’的人都怀疑李处长。”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处调来给林彪开车。他从不喝酒，我们关系很好。事件发生前他还是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候林彪外出转车。我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因为什么事同他谈话“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致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和我的极大污蔑。

张宁在书中第235页谈“林立衡和张青霖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北戴河。”“张青霖提出四条防卫措施：一、调动警卫部队砍树拦车，防备叶群突然出走；二、派人去机场破坏飞机；三、林立果一回来，借谈话之机先绑架林立果；四、等林彪清晨出来转车，把林彪救走。”

这四条完全是胡说八道。张清林（当时不是张宁书中用的“青霖”）只是林立衡的未婚对象，他初到北戴河，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四条措施”？

张宁接著又说：“张青霖急得在屋内踱步，空有办法却实施不了，他叹口气对林立衡说道：‘现在的形势，立果最危险，叶群最荒唐，首长最痛苦，你最难办。’”

张宁煞有介事地说林立衡在当天下午找林办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打招呼“保护林彪”，被召来谈话的人有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众人疑惑地看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找出谁是说谎者。”“林立衡当机立断，向四个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盯紧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这一段根本不真实。林立衡明知林立果的阴谋要害毛主席，不行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行就去苏联（这三条是党史研究的王年一说的，王年一的文章载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四卷上册中。王年一的文章注明是根据林立衡的“披露”和张宁的材料），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

当天下午，我根本没有参加她召集的所谓“保卫林彪”的会议。在叶群眼皮底下，她敢召集“林办”工作人员开那样的会吗？

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走，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她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21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8341警卫部队报告。

“不一会儿，小陈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说，‘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这是张宁书中243页的一段话。

张宁书中还说：“小陈和小张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睡觉，时间约十一点左右。”

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

真实情况是：林立果谋害毛主席的计划落空后，准备和林彪、叶群带着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林办工作人员于13日晨6时去广州。叶群在10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林立衡把我拉到小厕所，还是要我阻止他们上飞机，我还是说没有什么理由，不好说。她要我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张清林继续留在96楼看电影。林立衡的报告引起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总理找吴法宪查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情况，并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随同吴法宪一起到西郊机场查问，原已做好去广州准备的周宇驰紧急打电话报告已回到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叶群这才决定马上就走。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

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林彪怎样上的飞机，我没有看见。张宁那时还在56楼睡大觉，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她在书中248页却别有用心地，任意涂抹编造，如说：

“门外透进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的身影，左手握门把，右手提枪，向黑暗的屋内张望。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正琢磨他这副怪模样，他突然转身快步跑出屋子，发动车子，冲出院中。慌乱中，他绝想不到我独自一个睡在床上。”

实际情况是，由于周恩来查问三叉戟飞机，林彪南飞不成，仓促改为北逃。叶群、林立果心急如火，和林彪同乘一辆红旗防弹车，快速跑向机场。这时，叶群的车就停在边上，司机小慕已作了待命开车的准备，叶群不用。林立果逃命要紧，哪有心思在56楼下车去看望张宁？

张宁在书中第248页还编造说：林立衡和张青霖安置好我以后，跑回警卫部队值班室，周恩来仍然没有接电话，林立衡急得嚎啕大哭，对张耀祠说：“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张青霖抢过电话，擂着桌子大骂：“你们都是混蛋！早向你们报告了情况，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你们要负责……”“张青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

第251页中写道：“96楼直通莲花峰山外的林间小路上，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当时中央根本没有下达拦截车辆的明确指示，而是张青霖等人自做主张临时采取的措施。……”“当战士看清迎头冲下来的竟是林彪的座驾，都吓傻了，不及细想，自动向两边分开，让出通道，行注目礼让它过去。”

这些说法完全是在虚构电影故事。林立衡只是林彪的女儿，凭什么非要周总理接她的电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未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怎么能轻易采取措施？张耀祠是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的负责人，张清林是一个普通军医，还没有同林立衡结婚，他敢抢过电话骂张耀祠是“混蛋”吗？更不可能“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96楼下来，经过56楼、57楼到58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

张宁在书中说：“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和8341部队的医生共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会同8341姜队长，以及其他保卫干部再次验伤，确定张青霖诊断。”

事实是：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8341部队2大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58楼2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清林。姜大队长、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清林给我包扎的。林立衡关心的是林彪的行动，哪有什么人给我检查伤口，张清林有什么资格给我做“自伤”的诊断？

中央1971年下发的第57号文件，1972年下发的4号文件，都明确说明林彪是打伤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逃往机场强行起飞的。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组织上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一枪是不是自伤。只是在近几年林立衡才私下对人散布说“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

张宁还无中生有地说：“8341部队两个排的战士才赶到机场不久，围住飞机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见林彪专车驶到，从车内走下被叶群和林立果挽扶着的林彪，战士们不知所措，抱着枪瞧着他们上飞机，没一人敢上前阻拦。”

实际情况是追车的 8 3 4 1 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2 5 6 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可笑的是，书中第 2 5 6 页说道：“飞机起飞后 2 0 多分钟，留在 9 6 楼的‘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9 6 楼的人都聚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山飞来，在 9 6 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编造这一段假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 9 0 0 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 9 6 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机长潘景寅对山海关机场十分熟悉，飞机上有雷达，着陆灯等设备，机场无线电都处于开通状态。如果飞机真的返回山海关机场，降落是不会有困难的。

这架飞机是违犯禁航措施起飞的，机组成员中，副驾驶员，领航员，空中通讯员，随机服务员，被林立果从北京带到山海关机场准备上飞机的“联合舰队”重要成员程洪珍，为林立果服务并发了手枪的两名女青年张 X X，袁 X X 接到通知都在跑向飞机，因林立果怕后面的追兵，下令强行起飞才使他们没有来得及上飞机。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 he 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

我多次随同林彪乘坐飞机，飞机驾驶员会听林彪的指示飞向哪里。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的事。我还听说周恩来曾向机长潘景寅喊话，劝他们回来，“不管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将前去迎接。”

在“林办”工作的人都知道，林彪常常为小事训斥叶群，写条子警告叶群“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叶群离不开林彪，虽然她在林彪面前出了不少坏主意，也经常说假话哄骗林彪，但是她也是害怕林彪，大事还得和林彪商议，由林彪拍板。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给他打电话报告联系的人多是黄吴李邱这几个人。林豆豆说林彪最喜欢她，也最愿意听她讲真话，实际上林彪最喜欢重视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在庐山会议之后肯定也向林彪说假话，吹嘘自己，谎报情况，出了不少坏点子，但大的事还得由林彪说话。林立果在庐山骂叶群“瞎指挥”是真是事，不是张云生编造。据我长期观察，林彪和叶群之间，叶群和林立果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欲望，在政治上又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林彪的指使或点头，叶群是指挥不动林立果的。林立衡、张宁的所谓“自述”或“披露”，把一切坏事都归罪叶群，蓄意为林彪父子开脱翻案，是没有根据的欺人之谈。

1 9 7 1 年 9 • 1 3 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张宁及“林办”部份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我对知道的情况如实作了交代。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1 9 7 5 年解除监护被分配工作之后，也就是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张清林从郑州到北京，专门找我谈林彪出逃之事，说他们要写材料上送人大彭真委员长，问我，“林彪是否有精神病。”我告诉他：“林彪没有精神病。林彪的身体情况，

医院和保健医生都有证明，用什么药，病历上都有记载。”我还告诉他：“说话、写材料要有根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林彪身体不好，主要是怕水，怕拉肚子，容易出汗，没有其他大的毛病。”我说：“是他自己第一个上车的，不是叶群、林立果把他架上车。”

林彪的大女儿（和前妻张梅所生）林小林去郑州看望林立衡，林立衡告诉姐姐说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林小林一度信以为真特来问我。我实事求是地向她说了 9·13 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她改变了看法，不说假话。

林立衡回到北京分配在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之后，很少上班，四处活动，说“今后一生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替她父亲“翻案”。张宁书中写道，张青霖说：“我们这一生不会有孩子了。我们将尽毕生精力去完成一项既定的艰巨工作，历史需要我们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所以，为了今后无后顾之忧，我和你姐姐决定不要孩子。”

由于我在监护审查期间，如实说了我从林彪车上跳下来的原因是听到林彪讲“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不愿跟他逃去苏联才决心下车。这个事实说明林彪是自己要走，不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所以我就被林立衡一伙看成是为林彪开脱翻案的最大障碍，对我恨之入骨，各种各样的造谣诽谤接踵而来。如说我受伤的“那一枪是自己打的”，我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窝点”的特务。主要企图是逼我改口，不成就把我搞臭。

张宁于 1991 年 1 月随同他的丈夫林赛圃来到北京，由于运深陪同到我家来，名义上是说多年不见，探望探望，实际上是劝我不要在林立衡与林小林之间制造矛盾，劝她们姐妹和好，要团结。我告诉他们夫妇，林立衡不像她姐姐那样性格直爽，不好沟通，她不是有什么话实实在在地当面说出来，而是绕着圈子讲话。不是我要她们姐妹矛盾，而是她们之间在思想上的不同造成的。当时我们的谈话表面上还是融洽的，张宁、林赛圃还同我合影留念。时隔几年，张宁的变化很大，我成了集中攻击的对象。

林立衡当过报社副总编辑，很懂得宣传舆论的重要。特别是那些作家名人不断出书宣传，人们就容易相信。例如：“首长好像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来源就是张宁在《扭曲的虹——张宁自述》一文中最早出现的。以后多处传播，“好像”变成了“起码”，又变成了“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

林彪爱动脑筋，很能打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人心自然不服。但是，他在大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当了国防部长，一个劲儿“高举”、“紧跟”，吹捧毛泽东，在军队中整倒不少人，扶持黄、吴、李、邱几个亲信，不能说都是叶群的问题。

林彪是一个功过都很大的历史人物。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看法是各人的自由。但对历史事实既不能歪曲更不能捏造。9·13 事件的档案迟早都要解密公诸于世。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林彪最早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给他定性。1968 年 9 月 29 日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送给他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了这样的字句：“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些都是无可更改的事实。

有人说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和给黄永胜“有事和王飞联系”的亲笔信不可靠，“林办有人专门模仿林彪笔迹代林彪在中央文件上签字，一模一样。”实际情况是：那时候，到林办的文件很多，由秘书筛选重要的给林彪读。我在林办工作人员少时，也被任命为秘书给林彪读过外事方面的文件。我从警卫师选来的打字员李根清字写得好，给林彪，叶群抄卡片，模仿林彪的字很像，有时一般划圈签字的文件就让他代签退回。但重要文件是不让他代签的。秘书讲的重要文件，林彪在听讲后有时也叫留下给他自己细看。并不是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根本不看文件。李根清当时留在毛家湾，没有到北戴河来。叶群、林立果都不会模仿林彪的笔迹，别人更不敢胆大妄为代表林彪下手令了。

198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张宁等人任意捏造事实诽谤攻击，损害别人的名誉是违法的。出版社对自己出版的作品应该严格审查，只图经济效益，不严格审查把关，损害无辜者的名誉，同样应负法律责任。希望那些作家、出版社不要不讲政治，不要忽视法律的尊严。希望广大读者对市场上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书刊小报应有所鉴别，不要迷信这些“名人”才好。

□ 作者为原林彪卫士长，摘自《信使文摘》2000.10.19，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